

文史資料選輯

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印

1960年2月

目 录

略記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舒新城(1)

- (一) 少年中国学会
- (二) 我和少年中国学会
- (三) 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

雜記曹錦晦及江浙戰爭二事.....沙彥楷(8)

馮玉祥生平.....張之江、薛鶴瓶(10)

- (一) 出身
- (二) 辛亥前夕在漢州起義失敗
- (三) 在四川先打護國軍、后討袁世凱
- (四) 在廊坊討伐張勳復辟
- (五) 在武穴主和，駐兵常德，做陝西督軍
- (六) 參加直奉軍閥混戰
- (七) 从熱河回師倒曹吳，逐溥儀，到赴蘇聯考察
- (八) 由蘇聯回國，參加北伐，到背叛革命
- (九) 搞擴大會談反蔣介石
- (十) 九一八事變後到南京
- (十一) 一二八事變後到洛陽，回泰山，移住張家口
- (十二) 在察哈爾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
- (十三) 參加福建人民政府
- (十四) 从泰山到南京
- (十五) 參加抗日
- (十六) 抗戰勝利後赴美國考察水利，死在外國
- (十七) 生活作風

沈玉琳在美国.....刘良模(30)

福开森与新闻报.....严独鹤(32)

- (一) 独资独办报纸
- (二) 长期造谣全馆
- (三) 秘密出卖股权
- (四) 一度重还旧巢

江庸(36)

略記“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

舒新城

这里主要記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几次年会的情况。但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距現在已經四十余年，一九二五年第五次年会后停止活动，到現在也是三十五年，为便于讀者了解本篇記述的由來，特先述少年中国学会的概况和我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因而将本篇分为三段。

一、少年中国学会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統治而成立中华民国。当时受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因受了甲午战争以后丧权辱国的种种现实教育和資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封建統治发生反抗，而憧憬着一个資本主义的富强的国家。但从民国成立以后，軍閥割据，民不聊生，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既不满意于現實，又不敢面对罪恶的的现实作斗争，而因为阶级本质的限制，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也难于認識，于是一群爱国青年自造一些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象牙之塔”，以超政治为标榜，希望接受中外各种文化政治思想，形成一个改造中国的綱領，于是有少年中國学会的組織。

少年中國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由王光祈、陳濟、張尚齡、周元（太玄）、曾琦、雷宝春、李大釗七人在北京发起，經過一年的筹备，至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始在北京开成立大会，当时会员七十四人，均为求学国内外及从事文化事业之青年。據該会周年紀念册所載，此七十四人之分佈：對學法國者九人，留德者四人、日本者七人，留英美者各一人，在北京求学及从事教育譯事者十五人，在南京

求学及从事教育事业者十二人，在南洋从事教育及新闻事业者二人，在上海求学及从事新闻编译事业者四人。在成都求学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四人，散居武昌、长沙、天津、济南、福建、浙江、奉天、西安、广州各处从事工业、新闻事业等等者十五人。

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王光祈，他早年在故乡四川受过封建文化的深刻熏陶，五四运动前又接触资产阶级文化和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在五四时期成为一个积极的活动分子。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又不愿照走西方的老路，对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愿，不敢走。于是以超政治的面貌提倡反对政治斗争，兼容并包各种主义以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这基本思想体现在学会初期的宗旨中。即“本学会以振兴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

学会成立时曾公布规则七十条。依李大钊的提議，第二条规定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創造‘少年中国’”。第三条规定学会信条为“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对于征求会员规定三条标准：“一、纯洁，二、奋斗，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并附以說明，謂會員須具备以上三項条件，缺一不可。凡思想輕佻，行为卑鄙之人，本会認為根本已坏，不能救药。换言之，即不适用于本会所講纯洁之标准。奋斗有二义：学术上之奋斗，事业上之奋斗。本会認為凡能奋斗之人，无论其为学术或事业，将来皆必有成就，故本会取人以奋斗为标准，而不以智識为标准。……若夫消极之士，无论其如何纯洁，皆勿介紹入会，吾人对之，只有攻击而已。盖吾民族之所以墮落，外奸內賊之所以猖獗，皆此輩消极之士之“不作为”之罪也。……是已变消极为积极，则吾人亦当变攻击而为欢迎也。既纯洁矣，既奋斗矣，然对于本会并不表示充分同情，若吾人邀其入会，倘于干涉者存有若无之间，吾会何必多此

一位不热心之会员。同时并规定会员入会除须有会员五人之介绍外，并须经评议会通过。

修改的宗旨虽然比以前的有了进步，但仍是非常空泛、模糊，而这种抽象的宗旨、信条、标准，却很合当时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因为既可以逃避现实的斗争，又可以“超阶级”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幌子欺骗自己，满足自己的主观幻想，同时也有一些自我修养的条目，可以满足青年向上的要求，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有可能通过学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争取团结和改造某些人，因而在学会初期能够把不同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因为学会的信条和会员标准以及入会条件之限制，所以会员人数自一九一八年筹备期起至一九二五年停止活动时止，连自请退会及死亡者在内不过百零数人。兹照录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之“少年中国月刊”第四卷第九期会员通讯录所载之姓名共为九十五人。计周太玄、李劫人、周晓和、何鲁之、李璜、许德珩、陈登恪、曾琦、胡助、赵世炎、汪奠基、王光祈、张梦九、宗白华、魏嗣麟、沈怡、汤腾汉、杨钟健、余家菊、徐彦之、陈宝𫘧、周炳珊、方乐美、刘衡如、王崇植、赵崇鼎、康洪章、孟寿椿、张闻天、赤坤翼、康纪鸿、童启泰、杨亮、须豈、袁同礼、吴保丰、邵瑛秋、王克仁、郑伯奇、周佛海、沈懋德、李初梨、苏甲荣、黄日葵、李守常（大剑）、陈仲瑜、章志、高尚德（君宇）、黄公覚、文佑、刘云汉、雷国能、舒新城、李锐、穆济波、杨效春、曹乌、倪文宙、吴俊升、段子燮、陈启天、蒋锡昌、沈昌、黄仲苏、谢循初、唐敦、卢作孚、张明纲、彭云生、孙少川、刘泗英、李晓舫、郎辟祺、邓仲澥（仲夏）、刘仁麒、沈惺民、恽代英、杨贤江、常道惠、左舜生、田汉、梁绍文、涂九衡、金海观、恽震、朱自清、侯绍裘、朱镜宙、雷宝华、赵世炳、芮学曾、赵寿人、阮真、毛澤东、葛湜。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即决定发刊少年中国月刊，决定月刊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规定内容：（一）关于青年修养之文字，（二）关于讨论学理之文字，（三）关于批评社会之文字，（四）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创刊，由北京总会负责编辑，每年出十二期为一卷。一九二二年六月出齐第三卷后，休刊七个月，第四卷于一九二三年出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出完第四卷即停刊。自第一卷第八期起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担任编辑，用合议制。第四期以前之印刷经费，全由会员捐助。后以销路日广，第五期起改由亚东图书馆发行，一九二三年三月又改归中华书局发行。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又创刊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分会编辑，编辑人分为数组，轮流负责。并规定与少年中国分工范围，即少年世界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少年世界只出完一卷即停刊。

学会虽然对于少年中国月刊规定其宗旨和内容，但创刊号并无发刊词为之说明。少年世界创刊号有一篇“为什么发行这本月刊？”说明了学会对于改造中国的方针和两种月刊的任务。原文说：“我們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步骤。第一步：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于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第二步：详细记载由现代思潮演成的事实，給中国人一种更深刻的刺激。第三步：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趋势，草一个具体改造中国的方案。少年中国是做第一步工夫，少年世界便是做第二步工夫。这第三步工夫要让中国全体青年去做。我們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本月刊所记载的便是各种“社会的活动”，而且它的范围，永远限于“社会的活动”，决不会谈政治。

少年中国除编辑会员的一些自然科学的哲学文学论文，最重要的

是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其中会员通讯有许多是讨论学会方針的，并出过两期“少年中国問題号”，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研究学会发展和分化过程和会员思想的詳尽資料。少年世界除記載国内学校、工厂、农村的一些实际調查訪問的材料外，还介紹了苏联国际工人运动及留法勤工偷学的情况。这些提供了研究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对苏联与劳工問題如何认识的重要資料。

此外，还由成都出版“星期日”，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創刊，出完一年五十二期即停刊。內容以反对封建势力、揭露旧社会的种种黑暗为主。又依学会規約第三章第十九条之規定，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丛书系由会员自由編著，无一定計劃，故亦无系統可言。

二、我和少年中国学会

我虽出生于佃农之家，但从幼年起即受封建教育，少年又接触資产阶级的各种思潮，而受新民从报改良主义和黃帝魂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很深，一九一三年借得别人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又同时受了美国实用主义（美国教师首以杜威的“思維未作”教本）与中国宋元理学的思想影响，所以头脑中的思想真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但对于当时的軍閥混战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憎恨，而有爱国图强的主观愿望，而又不敢面对现实，进行斗争，于是以“思想自由”为护身符，以不問政治为口实，而躲在自己制造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救国”的象牙之塔里以逃避现实。初期的少年中国月刊很多文章是本着青年对国家社会的热忱，討論如何建設中國問題，很合我当时胃口，所以我是“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两种刊物的热心的讀者，对于学会有深厚的感情，后来也就加入了学会。关于我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曾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我和教育”中有两段文章讲

得較詳細，照录于此：

这两种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内容虽各有偏重，但对于当时的社会問題都很注意。执笔者都是純洁的“青年”，本其对于国家社会的热忱，发表真挚的言論，而少年中國各委員的通訊尤多关于如何建設少年中国之文章。我在长沙，即是此两种刊物的热心讀者，每期寄到，均从头至尾詳細閱过，而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二期王光祈的少年中国之創造一文中謂“少年中国的少年是要有創造的、社会的、科学的生活。实现少年中国主义的方法，简单說起来，要由我們一般青年与一般平民——劳农两界——打成一气，且为一种青年的国际运动；分析起来，就是（A）教育事业，（B）出版事业，（C）新闻事业，（D）改造个人生活”的一段話，正合我当时所謂文人本分的思路。該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譚代英怎样創造少年中国？一文，他本学会實踐的宗旨，主張注意研究群众生活的修养。把應該注意的事列成一表，分为活动的修养、合群的修养两大部門。在第一部門中又分計劃力、魄力兩項，在第二部門中又分得人信心、得人助力兩項。于計劃力之下，分为事前计划（周密）、临事计划（机警）、事后计划（要重慎以防流弊，要恒久以防中輒）三目，于魄力之下分对事要勇猛，肯負責任，对人要能指导人，能分配任勞两目。于得人信心之下分示以高尚純洁豪情（无私），示以成功成績（无为高远事，无为易失敗舉），示以不亏损朋友成績三目。于得人助力之下分和平謙逊，不与人生怨懣，以感情动人（爱他、信他、助他、諒他），增加善感，名利誣与他人，旁怒自任四目。他这篇文章有两万字，除去对于上述的各种项目有詳細的說明而外，并詳述何以要創造少年中国与創造少年中国应分工与互助的原因。这在我从幼受了曾濂生（医齋）与朱子教統的影响的少年看来，自然更合胃口。所以我对学会以及其会員的大部分都有特殊好感。因而以后遇着該会的会員都有一見如故之概。但在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以前，我不會加入該會，也無文字在該會發表。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我第一次赴沪，得見憲代英、左舜生，九年夏又在長沙第一師範與余家菊、陳周天、毛澤東等同事，十年（一九二一年）夏再赴沪，更見着曾琦、田漢、楊賢江、常道惠、梁紹文、朱自清、朱鏡宙、張聞天、沈澤民等，所得印象都很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去宁，与王克仁、邵爽秋、李炳勉、穆濟波、楊效春、曹白、倪文竇、陳启天、黃仲蘇、沈昌、唐毅、金海觀、方東美、劉衡如常相過从，对于学会及其會員的了解也更進一步，而同情心也與之俱增；加上学会于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四日在蘇州開大會，發表行動綱領九條，更引起我的共鳴。乃于斯年十一月經李炳勉、曹白、楊效春、穆濟波、憲代英五人之介紹正式加入学会。”对于学会的工作，只在一九二四年与楊效春、曹白共擬少年中國辦學計劃。一九二五年依南京大會之決議与黃仲蘇、李炳勉、吳俊升、曹白共任改組委員而已。可是我对于学会始盡量熱愛的。我會說過：“我在少年中國學會要承認後進，但我心安理得地願意加入一個團體，而且把它看作我最有關係的一部分，把會員們看作兄弟一般，願意為它服務，願意和它的分子見面，而見面能直率無顧忌地發表我的一切意見，一生之中，只有這一個少年中國學會。所以我雖无力扶育它使它長成，但我愛護它的深心，却永久不變。我寫此段已是四十七歲，而我對於它的愛護仍與十五年前一般無二。”這段話表示我的小資產階級的情感，也表示我所謂超階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本質。但在另一方面，這情感也使費了許多心思保存了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和有關少年中國學會的一些資料。

三、少年中國學會的幾次年會

少年中國學會創造的時候，雖然王光祈的反對政治斗争，兼容并

包各种主义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客观上任何人都不能超阶级、脱离政治，而十月革命的影响也逐渐深入知识分子，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酝酿着组织中国共产党。学会成员对于学会宗旨的看法有了分歧，虽然一九二〇年的周年纪念会，是在北京、南京、成都等地分别集会，专讨论学会宗旨，但一九二〇年八月北京学会谈话会上，李大钊就提出学会确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同人已历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少年中国月刊二卷三期，学会消息）。到一九二一年，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共产主义者的日常的言谈和行动已明确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来口头上表扬社会主义者，则显明地表现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大多数中间派会员，仍旧走着资产阶级学者的道路，对共产主义运动抱着漠视、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四日召开的南京大会上，提出了学会确定主义与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辩，形成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出席南京大会的会员共二十三人，代表了各地和各派的思想，除了会上发言外，不少会员在会外用书面表示了意见。少年中国月刊三卷二期、八期汇集了这些讨论的意见出了两期“少年中国问题专号”。这次会议讨论了月刊、研究会、丛书、会员间通讯、宗教信仰、恋爱和修改组织等问题，但中心议题则是宗旨主义与政治活动两项。共产主义者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等都曾出席，坚决地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成为政治性的团体。反对者为国家主义派头子曾琦、李璜及一些脱离实际的自认为超政治超阶级的学者。这次大会的争辩是学会两条道路斗争的最高潮。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三日在杭州开年会，只到十人，共产主义者只有杨贤江、高尚德（君宇）二人出席。在会上高尚德明白提出“希望

本会采取馬克思主义”，北京分会也由李大釗、邓仲絢、黃日葵、
刘仁靜、陳仲瑜、沈昌六人提出了“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的提案，宣傳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民主革命綱領。会散最后通过以下
的決議：“本会对时局的主張：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內謀軍
閥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
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
本会与必要时得与以相当的协力。”这和南京大会比起来，不能不说
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沪宁两地的会员在苏州举行大会，共到会员
十七人。共产主义者邓仲絢、譚代英、刘仁靜、楊賢江均出席。通过
了“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間去”的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
并制定学会綱領九条：一、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別注意英
美帝国主义，以矯正一般人因对内而忽略对外，因对日本而忽略对英
美的恶弊。更应矯正一般无識者亲善英美的心理。二、为打倒軍閥、
肅清政局，提倡国民自決主义。应注意打破国民依賴外力及其他軍閥
或其他恶势力解决国是的心理。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
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进行侵略的文化政策。
四、喚醒国民注意現實的政治經濟及其他社会問題，以矯正漠視国事
或专持漫薄的直覺以談國事，易致受外人言論所欺蔽等弊。五、推闡
經濟压迫为国民道德墮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証中华民族絕非劣等民族。
应反对此类减少自信力的各种宣传，且指示經濟改造为国民道德改造
的重要途径。六、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为各种切实有效的社会
服务。力矯浮夸偷惰，或只知无目的的修身求学而不問国家社会事務
的恶习。七、注意青年团体生活的訓導，須力矯不合群、不协作、不服从
規律等恶习。并应提倡各同志团体的相互协力，务使各团体弃小
私以就大同，以使人民活动漸呈集中的趨勢。八、反对現时知識界个

人享乐主义的趨勢，提倡堅忍刻苦的精神，以培养为民族独立运动牺牲的品性。九、提倡华侨与边疆教育，以培养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实力，且注意融洽國內各民族的感情，以一致打倒国际勢力的压迫。”（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八期）。苏州大会并决定今后月刊內容应当根据九条綱領，切实發揮，每期必有两篇以上的此类文字。但实际上月刊在出完第四卷十二期即停刊，根本上不會实行這項決議。同时学会本身是自由散漫、不許紀律的知识分子集团，而且每次到会者都是少數人，決議对全体会員沒有約束作用。其次这九条綱領的民族主义色彩很浓厚，也过分強調了教育作用，这是由于当时英美帝国主义者和直系軍閥勾結，大量供給借款和軍火支持軍閥发动川湘战争和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同时曹锟贿选成功，还頒布了一套伪宪法，企图統一全国政权。大会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和軍閥的忿恨，企图发动青年进行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要求。至于过分強調了教育作用則是由于出席大会的多数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这个綱領虽然有上述的缺点，但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爭執甚烈，只以形势的逼迫，始勉强通过，但在实际上，月刊操纵在国家主义者之手，以后的几期，每期均有宣傳国家主义的文章，也有譚代英肖楚女批駁国家主义的文章。同时，苏州大会又决定将总会由北京迁至南京，以便由国家主义者控制。另一部分书呆子則仍在作超政治的好夢。苏州大会而后，学会的向左、中、右分化已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于是有一九二五年南京大会改組的決議，也就是学会最后一次的年会。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七至二十日在南京开第五次年会，到会者只十八人，除共产主义者譚代英、沈澤民、張聞天，国家主义派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均出席。第一日在鸡鳴寺开会，以深入討論不便，第二日遂移至国民政府六号院孙中山家中繼續举行。第一日只報告会务，談

談个人生活情况，第二日談國內外形势及学会前途，第三日互相辯論，第四日決議改組。陳代英因上海有事，參加第一日會散后即返沪，沈澤民、張聞天代表共产主义者方面提出学会应采取馬克思主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會員應參加政治活動，不能离开政治評学术、評事業，國家主义派則极力反对而欲将学会改为国家主义的团体。討論數日，各不相下。而当时所謂“超然派”者亦复不少，他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懶学会演变为政党。不懶任何一派挾学会以自重，但又很爱护学会，深恐学会爭議下去，陷于破裂，不可收拾。到第四日由黃仲苏代表这一派提出緊急動議，于即日起停止介紹新會員，設立改組委員會。由本届年会授予調查及改組全权，拟具表格及規約，分別調查會員思想及对学会态度，并請報告入会以后学业及事业之成就。調查期限自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底止。該委員會將根據調查結果及規約處置一切。當經出席會員全部同意接受，并舉選舒新協、黃仲苏、李炳勉、吳俊升、曹允為改組委員會，負責辦理調查及改組事宜。

一九二六年春調查期限已滿，改組委員會于三月在黃仲苏家中开会审查各項檔案，紀錄如次：

一、自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起至同月二十九日止，函續分別挂号由邮局寄出至国内外各地會員調查表格正付兩張，共計一百〇二份。時會員死亡及自請退會者已有六人。

二、因国内外會員住址更改，无从投递，而隨後退回之調查表格計四十九份。

三、確已收到表格而逾期未填報者計十九人。

四、確已收到表格而來函說明不懶填報者計一人。

五、填具表格寄回審查者計三十三人。

茲將審查三十三份表格所填具第一及第二兩項答案分析如下：

一、对于目前內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何种主义？

信仰三民主义者吴保丰等三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等五人，国家主义者曾琦等十二人，其他如少年中国主义、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大同主义者王光祈等十三人。

二、对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之改进究竟何种态度？

甲、主張凡屬信仰某种主义，組織政党，或已加入某种集团，实际参加政治活动之会员皆应自請退出，俾少年中国学会得保持原有宗旨，成为一純粹研究学术之組織。簡言之，主張少年中国学会应保持为无党派会员之集团者計宗白华等十七人。

乙、表示对少年中国学会至为爱护，并希望大家勿談主义，仍当携手合作，以准备救国工作者計沈君怡等七人。

丙、提議将少年中国学会彻底澄清，改組成为某一种主义之集团者計李璜等五人。

丁、贊成将少年中国学会解散以免为某一党派所挾以自重者計毛泽东等三人。

戊、確認少年中国学会是社会活動的团体，不能开除政治活動意見不同之會員，并提出具体意見以改进会务者計王光祈一人。

改組委員會在審查分析表格之后，无法执行大会所授的职权，因为填具表格之會員，仅全部會員三分之一弱，而意見又復紛歧。經討論后，作出決議如下：

根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第五屆年會決案，授予改組委員會以全权，負責辦理調查及改組事宜。茲因多數會員住址更改，致調查表格无从投送，未有机会表示意見。為慎重計，暫不采取任何行動，仅将业已收到之調查表格分別記录，留待下屆年會提出報告，再

行討論如何改進會務。

改組委員會如此決定，實因當時國家主義派已組織青年黨，堅決反對共產主義。改組委員之中的曹允、吳俊升也是國家主義派，其余三人，雖然對於共產主義有所懷疑，但却堅決反對學會為青年黨所利用，（若照收到會員表格多數改組為某一種主義，必然為國家主義），實際上收到之三十三份表格絕不能代表學會全體，而且學會的決議從來不會對全體會員起過約束作用，委員會就要執行大會所授權力進行改組，也只是具文。所以決議留待下屆年會提出報告。——當時委員會也估計到下屆年會必難開成，如此決議，只是不了了之的辦法而已。

自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籌備時起，至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止，少年中國學會實際存在了七年。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後改組委員會的活動，只是一種尾聲而已。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歷史最久，會員人數最多，分布地區最廣，分化也最明顯的一個社團。它的創立是自发的，反映了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在內憂外患壓迫下的愛國熱忱。以後逐漸分化，又反映了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兩條道路斗争的尖銳。它的成員是五四時代全國各種各類青年知識分子的縮影，它的活動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希望研究近代史尤其是研究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思想分歧與發展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初期在知識界的斗争史的同志，對於少年中國學會能作更深入的研究！

